

# 一生致力于中国基督教大学的芳威廉

金开泰



芳威廉 (William P. Fenn)，他 1902 年出生在纽约州的新罗泽尔。他的父亲科特内·H·芳 (Courtenay H. Fenn) 牧师，是一名长老会传教士。撰写了一份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报告，并编纂了第一部中文《圣经》和早期汉英词典。芳威廉是随在中国传教的父亲长大的。回到美国后，芳威廉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在纽约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在爱荷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23 年回到中国后，他开始在东郡的北美学校教英语。1933 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外语系主任，主持系务 10 余年，具有丰富的经验，使外语系在教学上取得了颇多成就。学生普遍具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外文系以英文为主，重视对低年级学生的基本英文训练，特别注重英文单字、文法、会话的强化训练。开设了“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英文小说”、“英文戏剧”、“英文论著选”等专业课程。外文系还为理学院、农学院的学生开设英文必修课与选修课，如“科学论文与作文”、“现代英国戏剧”、“英文诗歌”、“圣经文学研究”等；为提高教学质量他组织老师们，结合长期的教学经验，编写实用教材。

1937 年底战火燃烧近南京，他随学校迁往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继续任教。1938 年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CM (通讯) 会员，1944—45 年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副会长，1945—1946 年任会长。他和郑德坤教授和克雷西 (E. H. Cressy) 博士领导了华西坝上的比较文化研究所，通过组织通过系列课程、综合性研讨会、赞助讲座和交换教师和学生等方式进行。以后希望出版相关书籍，例如：《中国文学通俗史》，《美国文学通俗史》等，以更好地增进美国和亚洲之间的相互理解，

1942 年，他成为建立于 1932 年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在中国的驻地代表，是在中国国内负责协调校董联合会与基督教大学的干事。他一再向董事会呼吁，希望各差会派送真正合格的教授到中国基督教大学任教。所选派的人必须是

富有感染力的灵性和经验，是饱学之士，优秀的演讲家，能与儒家和佛家对话，能理解并宽容其他的信仰，还要有足够能力解决学问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他也呼吁“利用现时机会，缔造基督教大学的美好未来”，支持校董联合会的进一步联合计划，促成了1945年9月为所有参与学校服务的单独法人团体——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的成立。

对募集资金分配到大学使用上，他建议在战后基督教大学的体制中，从国外来的经费不要笼统给大学，要专款专用，符合捐款人的意愿，因为经费太分散，像哲学系就很容易被忽视。

1945年10月他同美国出版家鲁斯一道，到收复区视察，为南迁教会大学的北返做准备。历时三个星期，经过西安、青岛、天津、新平、南京、上海各城市，11月回到成都。他接受燕京新闻的采访时说到收复区的现况，尤其是原各校的情况。金陵大学的校舍并无破坏，损坏、需要修理的只有小部分。已由留守的五、六位教授和先行的贝士德教授等接收完毕，明年复员不成问题；燕京大学损失也不大，被日军搬走的器物也只是一部分。明年回北平困难不大。而且燕大已招收新生190名，补习生250名，已开始上课。齐鲁校舍也完好，只是一部分校舍至今仍为日军的伤兵医院。关于各大学的复员，在纽约的托事部已在积极筹备一切计划，帮助各大学在战后继续发展下去。至于传言的只帮助燕京、金陵、岭南三校恐不确，所有教会大学都将得到帮助。（燕京新闻1945.11.15一版）

1946年他与金陵大学一道返回南京。1947年，他调到位于曼哈顿的联合董事会总部担任执行秘书，1951年成为执行秘书。头衔改为总干事。1952年，一个世纪前开始的中国内地基督教大学，经历大约70年的历史后结束了。方威廉所服务的中国基督教联合董事会于1951停止了在中国内地的工作，将其努力转移到其他地方。1955年改成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给台湾东海大学提供了最大的资金支持。东海大学是由联合董事会为继承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事业，在台湾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1952年开始筹建，1953年建立了董事会，得到了台中市西屯区大度山一片土地，11月11日由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主持奠基仪式，1954年前福建协和大学校长陈锡恩赴台，帮助制定了详细规划，1955年正式招生。1951年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友在台北筹组复校，1954年法学院被核准，1957年在双溪获得土地建校，原东吴法学院院长石超庸担任校长后，增设文学院与商学院，1966

年加入了联合校董会，1969年恢复了东吴大学的名称。

芳威廉在联合董事会一直工到1970年退休。1993年芳威廉在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敦(Doylestown)的一个退休社区去世，享年90岁。

芳威廉和前弗朗西斯·科克斯结婚35年，她也是一名教师，死于1964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前普里西拉·霍尔顿·内夫，也去世了。他有两个女儿，圣地亚哥的Sarah Fenn Luth(莎拉·芳·路德)和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Mary Fenn Hazeltine(玛丽·芳·哈泽尔廷)，7个孙子8个曾孙和3个继子Charles John和Sam Neff(查尔斯、约翰和萨姆·内夫)。

#### 芳威廉博士笔下的中国基督教大学

芳威廉博士一生都在为中国基督教大学服务。他在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战时发展和制定战后计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由W. B. 埃夫曼出版公司1976年出版，2002年由中国学者刘家峰译成中文，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由于他在中国亲身参与大学或直接面对大学的工作，又长时间在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管理层，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非常熟悉，因此他的书不像一般纯粹的学术研究著作，更像是一生参与中国基督教大学工作的回忆。该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萌芽时期(1850—1900)，随后进入形成(1900—1920)及成熟(1927—1937)时期。在它们的最后岁月前，作者专列一章(第四章)评价，展示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辉煌。把抗战时期与战后重建放在最后一章。附录则列入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一些基本数据。纵观全书，作者倾注了个人感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表达了当事人的看法与情感。尽管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或许能让后来者更容易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真实。

在叙述中国基督教大学历史的一、二、三、及第五章，作者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各大学的诞生，发展、合并及其变化的主要经历和重大事项，展示了各校之所长及对中国的贡献。

作者最着墨的或许是第四章。他把中国基督教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从7个方面来阐述它们在变革的中国里起到的积极作用。

他首先提出这些大学的身份问题，即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者毫不讳言“基督教大学进入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他们的外国特征。不管这些

大学在何处，也不管他们如何急切地要为中国服务，他们很明显是外国大学。”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尚未建立的时代，任何新事物都不可避免来自外国。现代大学明显是舶来品，和中国传统教育绝然不同。引介者是西方人，他们提供的模式基本上是英美式，课程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而这正是中国人所需要的，并把它等同于他们所追求的‘现代教育’”。“在纯粹由中国人举办的学校还缺乏时，这些学校对教育的贡献远胜于他们的外来性。”但是大学最令人诟病是校长是外国人，院系领导和大部分教师也是外国人。所以“在 20 年代民族主义潮流兴起以后，无论如何，本土化成为学校势在必行的举措。”<sup>①</sup>所有的基督教大学都面临着取得中国政府的正式认可。同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教员的数目在稳定上升，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资格做教员。……”1925 年教育部公布了“外国资金所设立学校”在政府立案的条件。1927 年再次强烈要求立案。到 1933 年除圣约翰（1948 年最终立案）外，所有学校都已立案。

各校立案后，“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富有建设性。基督教大学遵从部颁课程，和国立其他私立学校地位平等，同样受官僚政治的控制，偶尔也受益于政府的资助。不过，这一相对轻松的感受并不能同样延伸到国民党，它对所有学校师生都进行严厉监视。国民党鼓动学生参加三青团，但并不成功。对于老师也要加入国民党，但参加不是强迫性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入党。基督教大学校长只有很少几位是国民党员，而且只是名义上的党员”由于国民党推行严厉的思想控制，甚至在班里安插间谍，使师生对国民党更加疏远。<sup>②</sup>

关于教学与研究。作者实事求是地说：在 1925—1926 年的一次评估中，两所 A，五所 B，四所 C，五所是不讨人喜欢的。1937 年，所有的基督教大学都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声望，有几个在中文学术界排名很高。但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中最强的完全可以和美国教会大学中较好的学校相媲美，然而大部分只是更接近美国的平均水平。”他列举了英语、中国语言文化、美术、音乐和文学、科学、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来加以阐述。

英语：基督教大学在把英语引进教育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极大地满足了突然普遍兴起的对英语的需要，确立了值得尊敬的成绩标准，而且训练了很多男女学生，他们对英语的掌握成为服务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工作对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有很大贡献。

中国语言和文化：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基金为燕京提供了100万美元，岭南70万美元，金大39万美元，华西协合20万美元，齐鲁15万美元，福建协和5万美元。结果出现了少数几个相对强大的国学系，以及相当重要的研究和出版物，这些大大改善了基督教大学的公众形象，它们是中国大学，而不是外国的。（124）例举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著作。

科学：它们很早就要求有明显的科学倾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们在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纯粹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在某些方面的科学教育，它们是开拓者；有时候，它们还很杰出。如同日本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它们也参加了中国的觉醒，使中国进入了以西方为导向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对中国社会及其领袖做出了重要贡献。③在这一领域，基督教大学取得了显著成功，在它们的主要贡献之上。

在职业教育方面，他从医学、农学、宗教与神学、其他领域作了阐述：

医学教育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最具影响的贡献之一。从一开始，医学传教士就着手培训中国助手。基督教医学教育在中国的故事，经历了很多的创办、关闭与合并，最后出现几个特别成功的学校。无论怎样强调基督教医学教育的贡献都不为过。新教差会创办了最早的医院和诊所。他们开办了第一所医学院，（1880年文惠廉开办的医学培训，实际是圣约翰书院的医学部，1886年成为医学院）直到进入20世纪，以西方为导向的大部分医院和医学院都是传教士开办的。战后，有四家医学院（还有一家牙学院）是基督教大学的一部分，还有一家没有这样的附属关系，还有一家政府和差会联合办的，这六家医学院都在中国最重要的医学院行列中。

基督教医学院不仅是先驱者和刺激者，而且还引进了现代医学概念，确立了有价值的范例。它们引进了基本技术，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其中包括标准医学著作的翻译。在中国基督教会出版委员会的资助和纪立生医生的指导下，教科书翻译委员会在山东基督教大学成立，基本上解决了教科书缺乏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医学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差会的创造，尤其是它们的医学院的创造。在很多年里，这些医学院为中国输送了数以百计的、受过良好训练、经常有高尚品德，而且很优秀的医生。它们为公立和私立医牙学院提供了大量教员，这与基督教医学院的数目很不成比例。

基督教差会的另一贡献是医学院在护理教育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这并不都是在四年制大学的水准上。差会医院使护理服务从仆人提升到有尊严的地位；差会训练学校在妇女护理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传教士和差会培训的护士是创建中国护理专业的关键人物。④

农业教育方面。首先，它们帮助激发和创立一套农业教育、推广和研究模式，公立和私立农学院最后都在追随金陵大学。其次，他们贡献了大批在一开始极其缺乏的人才。这个话对金大尤其合适。金大的社会与经济研究是开拓性的。其研究方法对理解中国乡村具有深远影响。岭南和金大都从事桑蚕方面的研究，通过发放无病蚕种，对蚕种改良贡献颇多。从科学知识到实践的推广工作主要是发放改良种子和幼苗。

基督教大学的成功与海外的支持分不开，这点他作为管理层是清楚不过的。他说：海外资助是它们生存的重要因素。没有这些资助，它们既不会存在，也不可能继续下去。海外资助的规模很难算出个精确的数字，但最后的确有惊人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到基督教大学里。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几十年里，这项投资包括大约 5000 万美元现金和 2000 名西方人员。开始时的涓涓细流逐渐变成了真正的溪流，通常太小，还不能满足那些所有想喝水的，但是这是发展中国教育有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慈善事业的宏伟展示。⑤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校董联合会相关的 13 所大学每年从差会、基金和募捐中总计收到约有 80 万到 90 万美元。这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差会，四分之一来自基金和募捐。战争爆发后，基督教大学需要额外的资助，提供了维持基金大约 25 万美元。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有的支持都合并为一种资金，大部分是由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提供经济支持。在 1943—44 年这一支持共有 66 万美元；在 1943—1944 年全国战争基金启动后，支持达到 1115787 美元。战后最初几年，有近 200 万美元用于复员，更多的钱用于日常经费开支。⑥

来自国外的支持，不仅有重要的物质帮助，还有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大学之间体现出的国际关系。总共有 25—30 所美国大学通过它们的本科生、教员、校友或通过给予研究生奖学金，为基督教大学做出贡献。⑦

作者在最后一章又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基督教大学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影响。中国基督教大学对世俗社会的主要贡献在教育领域。基督教大学提供了几乎是中国最

早的现代高等教育，这是中国很急需并且千方百计要努力引进的。在进入 20 世纪后，它们仍然不仅是中国教育的主要部分，而且也是第一流的。通过示范和竞争，它们成为其他学校的行动向导。它们提供了模式，引进了新的理念，确立了有价值的标准和目标。

基督教大学在增进国际理解和亲善方面贡献卓著。基督教会无意中充当了西方文化的媒介。基督教大学通过提供西方的语言、知识、价值和人员代表，在这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他们，西方最好的东西到了中国，在基督教大学中，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了交往，并非没有摩擦，但通常不会引起战争，而是互惠互利；中国的知识也通过基督教大学的诠释和示范，传到了西方。作为欧洲和北美基督教徒关怀的一种表达，基督教大学成为精神和文化的使者。帮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尽管有帝国主义联系和外国特征的阻碍。它们是西方文化的引进者，也是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发生伟大革命的参与者。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相遇，它们燃起了变革之火，帮助中国塑造未来，这伟大的未来不同于人们所能预见的一切。

一种文化的基督徒对另一种文化与社会的人们进行广泛而且有效的服务，虽然在某些时候也犯了错误。除掉基督教大学已犯的所有错误之后，它们代表了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一个伟大民族所做的显著又崇高的贡献。经过多年的再生和变革，基督教大学已成为中国教育中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的名字将被永远记住。⑦

芳威廉博士眼中的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坝上的住宅（芳威廉相册）

芳威廉在华西坝上住了八年，对华西协合大学也有深切了解。书中的字里行间也带有深厚的感情。在形成期，他说：关于高等教育的首次提议来自加拿大的卫理公会，1903年，该会曾考虑过建立一所加拿大卫理公会学院的可能性，学院要提供文科、神科及医科，医科是他的首要关怀。美以美会1904年创办了一所“学院”。他们认识到许多小的独立学院是不可行的，就召集各差会的代表聚在一起。勾画了一个联合大学的计划。并于1905年4月交给了芝加哥大学的巴顿(Burton Ernest D)教授和张伯伦(Chamberlain Thomas C)教授，此时，他们正在调查旅行。这项计划立即送到国内董事会，反应大部分是令人气馁的，不过仍在继续讨论，并在1910年拟订了一个章程，成为联合的基础，并将贯彻到大学始终。……在大学筹划时期主要的领导人是一群有创造力、精力充沛的传教士，如神学硕士启尔德(Omar Kilborn)和神学博士毕启(Joseph Beech)。在实际动工作中一个人的领导是必要的，1913年毕启当选为校长，他担任此职一直到1931年中国人开始做校长。虽然有许多能干的同事辅助他，但主要还是他的领导使华西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

创办者从一开始就寻求一种不要太美国化、加拿大化或英国化的教育体制，而是要适应中国的需要。除了最早的文理科外，1912年开办了师范学校，1915年增加了宗教科，1914年增加医科，1917年增加牙科。国学研究很早就给予特别重视。到1920年华西有将近100名学生。⑧

在评价中他对华西大加赞赏。他说：最后发展，但也是最成功的医学院之一是在成都。在华西创办一个大学的基本理由是要为这个地区培养中国医生。1914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开办四年之后，一个医科在成都一座两层小楼上开办了，有5名美国和加拿大医生做教员，班上有7名中学毕业生。这一发展背后的推动力是加拿大英美会的启尔德医生，他的儿子启真道(Leslie Gifford Kilborn)带领学院走过了最艰难同时也是最强盛的年代。最初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至于华西甚至考虑把学生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读完最后两年。但到1917年，差会决定在成都开办四年制的学院，并在一个更大的中心地带开始了建设。同时，林则(Ashley W. Lindsay)医生，他也许是开办了第一个牙科诊所的牙医传教士。在1917年，他教授的牙科课程发展成牙科系。到1921年，它发展成一个学院，这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工作，很长时间内它是独一无二的，它培养出很多优秀的牙科专家和教育家。

到 1927—1928 学年，牙学院和医学院合并成医牙学院。课程 A 级医学院和美国牙科学学校的模式。它在纽约州立大学评议会授权的执照下颁发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到 1948 年注册医学的学生有 376 名，牙科学生有 76 名，全部学生约有一半是妇女。

对抗战期间，几个大学在华西坝上联合办学，他也作了热情的讴歌。他说：对华西大学而言，战争虽然没有使它迁移，既不用地下活动，也不需要到一个新地方，但它为华西带来了显著变化。日本占领南京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离重庆不到 200 英里的成都也分享了自由中国中心的危险和艰苦。在一年之内，它接待了另外两所大学，最后招待了四所大学。到战争结束时，大部分原打算用作“临时”的建筑实际上成了“永久”建筑，原来容纳 440 名学生的校园现在却有十倍的人数。局势的不稳定、营养不良、拥挤和通货膨胀夺去了这些大学很多人的生命。



左起：芳威廉、诚静怡、张凌高（芳威廉相册）

但是，战争年代并非没有进步和成就。“下江”来的大学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标准；不同经济和知识背景的同事带来了很多变化。华西现有的教学与研究计划要比只依靠当地资源丰富得多。示范和绝对的必要性让相当多的中国人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行政和教学岗位。这些年他们的研究和公共服务，也是由示范和时代精神所刺激，得到了重视：准备急需药品，帮助制糖工业，推广课程，协助工合、成立家政系，进一步发展农学，1941年成立农业研究所。⑨

随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以及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的到来，这里也是四川国立大学的所在地，成都成为自由中国三个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这群独立学校之间的合作成了他们密切而且很自然的接近，虽然并不容易，但整体上讲是出乎意外的成功。校长联系会议和教务长联席会议对行政管理大有帮助，通常，三四年级的课程面向所有够资格的学生，不论在那个学校注册，但事实上，教员是由不同的学校选择，或是临时安排，并没有进行最大可能的协调。⑩在成都的五所基督教大学构成了中国此类工作中最大最强的中心，并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合作，不仅前所未有的，而且以后绝无仅有。

几十年后，芳威廉博士的女儿玛丽（[Mary Fenn Hazeltine](#)）和她的朋友穆言灵（[Elyngreggheney MacInnis](#)）及穆彼得先生（[Mr. Peter Paulsen MacInnis](#)）将芳威廉博士当年在华西坝上留下的，数以百计的照片扫描后，制成光碟，于2019年4月访问成都时，专程送回学校，说“这是你们的历史，应当由你们收藏”。她们秉承乃父的精神，让我们十分感动。

注：引文在《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①（106）②（116）③（130）④（147）⑤（195）⑥（201）⑦（247）（189）⑧（55—56）⑨（216）⑩（217）

取材：纽约时报在芳威廉逝世时的报导及刘家锋译的芳威廉著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 该文由张颖明校正的英译本经芳威廉博士的女儿玛丽（[Mary Fenn Hazeltine](#)）阅过和修正。